

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经验

——兼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冷兆松 宣宇才

摘要: 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脉络,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首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的党内关系,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这个历史时期的党内关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历史经验表明,党内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和健全,党内关系挫折和失败的重要根源在于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和废弛。2012年,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和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党内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重要地位。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既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抓住“四个服从”是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牛鼻子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四个服从”的重大发展创新。

关键词: 党内关系;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十九大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7)06—0014—05

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内关系问题上,从正反两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历史文献表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党内关系问题,都高度重视汲取历史经验和坚持优良传统。十九大报告表明,习近平在关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述中,同样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

一、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脉络与基本概况

(一) 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脉络,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

首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的党内关系,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14年的挫折与探索,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结束了错误处理党内关系对全党的统治。二是,1935—1948年的延安时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觉悟起来,逐步学会如何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其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至今这个历史时期的党内关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爆发前的17年,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总体上继续保持和发展,但是在“文革”前的十年中党内关系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曲折和错误;十年“文革”时期,完全背离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确理论和原则,党和国家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恢复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确原则和优良传统,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一定的新情况。

(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党内关系的基本概况

在这14年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和挫折,给了全党很深刻的教育,为我们党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积淀了丰富的反面教材,以遵义会议为契机结束了错误处理党内关系对全党的统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所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然而,党在幼年和早期,还难

作者简介:冷兆松,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宣宇才,男,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以深刻理解和正确适用民主集中制原则,还难以构建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准则和制度。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逐渐认识到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全党逐渐深刻地认识到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义。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①

(三) 1935年至1948年延安时期的13年,堪称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黄金时期

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比较完整地形成了。^②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理论基础。1937年,毛泽东论证指出,解决党内矛盾、处理党内关系,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而不能用“过火的斗争”方法。“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③毛泽东的《矛盾论》,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提出和系统论证了只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处理党内的关系。《矛盾论》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揭示和分析过去十几年中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方法处理党内关系的错误性质和严重危害。《矛盾论》奠定了我党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指出培养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对于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重要性。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1945年,中共七大对正确

处理党内关系作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发,通过党章的形式作出制度保障。经过延安整风和七大,我们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④。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党内关系的基本概况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爆发前这17年的党内关系,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为标志,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7年,党内关系继续延续延安时期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其二,“文革”前的10年,党内关系总体上是好的,但是,期间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曲折和错误。

1949—1956年这7年,在处理党内关系的各有关方面,不但坚持了延安时期形成的正确原则、方法和传统,而且还有发展和创新。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准绳,构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思想。

在1957年十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内关系越来越紧张,党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⑤

其次,1966—1976年“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⑥,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党内关系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被“文革”搞乱的党内关系的优良传统,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凸现在全党面前。

(五)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系的基本概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336页。

④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⑥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0页。

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79年2月《准则》草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1980年2月几经修改的《准则》草案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十一届五中全会重申“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就能使全党在中央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①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准则》指出:(1)在处理党内上下级关系方面,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要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利益的同志,任何人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2)在处理同志关系方面,只问他是是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不应因为私怨而耿耿于怀、排挤打击,不应由于亲疏而有不同的对待。绝对禁止搞宗派活动,搞小圈子;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3)在处理党内斗争方面,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②

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了正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③2006年1月,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章明确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发展党内民主指明了方向。^④2008年2月,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发展平等和谐的党内关系,倡导和鼓励党员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在民主讨论中凝聚共识。^⑤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规范和纯洁党内同志交往,领导干部对党员不能颐指气使,党员对

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恢复和发展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和优良传统,在实践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成效是显著的。

二、汲取历史经验 继承优良传统

在不断地回顾和总结自己经验教训中开拓进取,是中国共产党从曲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新胜利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传统。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和处理党内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教训,也积淀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

(一)党内关系极其重要,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党的事业得失成败

1956年9月10日,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中国革命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次路线错误,革命受过很大损失,经过延安整风,我们才觉悟起来。时间那么长,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使我们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⑦

历史教训反复证明,当“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着全党的时候,在处理党内关系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倾向和传统。结果是怎样呢?党不是发展了,而是大大地削弱了;革命不是发展了,而是受到重大的挫折。毛泽东很重视对这一历史教训的反思。他说“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⑧“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⑨

反之,通过延安整风,我们党开创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80-381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9-377页。

③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④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第1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第5版。

⑦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40、141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5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9页。

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我们党就能够团结更多的人在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共同工作,绝大多数犯过错误甚至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能够改正错误,结果是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事业取得重大胜利。

(二)党内关系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和健全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处理党内关系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的合理构建,必须以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为准绳;处理党内关系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以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健全为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党内关系。

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党内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和健全。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6年八大这21年的时间,党内关系得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和健全,建立健全了一套优良的民主制度,使党内关系的构建和处理,取得了极其成功的经验。

延安整风是全党进行民主教育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次极宝贵的实践,七大对我们党执行民主集中制和扩大党内民主的经验教训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八大总结了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作了系统的概括和阐述。

八大把加强民主集中制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联系起来,强调努力解决以扩大党内民主为中心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克服对发挥党员群众和下级组织积极性创造性不够的缺点,克服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的缺点;二是强调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三是明确提出反对在党内搞个人崇拜的问题和任务,强调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

其次,历史教训表明,党内关系挫折和失败的重要根源在于民主集中制的破坏和废弛。

党内关系破坏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表明,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

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只有坚持“四个服从”这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才能坚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1980年,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文革”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党就失去了统一意志和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必须严格维护和极大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①为了修复和重建被十年“文革”破坏的党内关系,邓小平把“四个服从”,强化为“四个必须服从”;并且,强调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是最重要的,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

2012年6月,习近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②2014年5月,习近平进一步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党内关系各个层面的统领和指引地位作出详细说明,他说“要坚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组织、组织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内和谐,实行正确集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③这里,习近平所说的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组织、组织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包括了党内关系所涵盖的主要方面。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是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集中,互相渗透,互相保障,缺一不可。“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④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一方面要充分扩大民主,力求汇集全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一方面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和自由放任主义。“如果离开集中谈民主,就会违背民主原则,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那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⑤

集中的目的,是凝聚全党智慧,形成全党共识,实现一致步调。“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272页。

② 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年第15期。

③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209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①

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内关系问题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和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党内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重要地位。

(一) 要求全党坚决反对“八个主义”,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的党内关系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这“八个主义”,实际上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关系中长期存在顽疾的集中表现。

这“八个主义”严重搞乱了党内关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醒全党予以坚决反对。2014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二) 把全党服从中央提升到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的高度,是十九大报告对“四个服从”原则的重大发展创新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被简称为“四个服从”。它既反映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是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内容。“四个服从”是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形成的优良传统,

凝结着党的集体智慧,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基本准则的核心内容。

这个重大创新,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践经验的总结。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显著遏制,党内的各种关系和政治生态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这样成果的关键在于,通过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全党服从中央落到了实处,形成了全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良好政治局面,提高了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了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抓住了“四个服从”,就抓住了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的牛鼻子。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就深刻认识到这个真理。他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必须重申“四个服从”这四项最重要的党的纪律。^②1980年,为了修复和重建被十年“文革”破坏的党内关系,邓小平也是抓住“四个服从”这个牛鼻子,而且,把“四个服从”强调为“四个必须服从”,并且强调“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是最重要的,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③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既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抓住“四个服从”是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牛鼻子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四个服从”的重大发展创新。

(三) 坚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如前所述,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得之不易和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党情国情,应该长期坚持和实行。

[责任编辑:云社]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2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272页。